

审美惯性：城市在巅峰期丧失创新能力的隐性机制

城市成功运转本身会沉淀出一套前意识的审美感知结构，它在审慎权衡启动之前，就已把异质的念头标记为「不体面」「不像我们做的事」而排除出局。

蔡彦 著·之二·城市发生学·发表于2026年7月29日·约 2.2 万字·预备学员首发

摘要

城市研究中一个未被充分解释的谜团：为什么一些在特定历史阶段最繁荣、运转最顺畅的城市，往往在其巅峰期就悄无声息地丧失了产生根本性创新的能力？本文提出“审美惯性”解释这一现象。与将城市衰退归因于外部冲击或制度锁定的既有理论不同，本文论证：城市成功运转本身，会在其体内沉淀出一套被集体共享的、前意识的审美感知结构——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做的、配得上这座城市的”的直觉性判断。这套结构在行动者尚未进行审慎权衡的层面，就已将那些尚处萌芽中的异质念头标记为“不体面”“不像我们做的事”“不合这座城市的身分”，从而系统性地在创新被正式思考或公开讨论之前就完成了对它的排除。这不是城市活力的消解，而是创新可能性的提前过滤。论文从威尼斯和曼彻斯特两座城市在巅峰期丧失转向能力的历史矛盾入手，让概念从历史材料的裂缝中自然逼出；进而通过与制度逻辑理论、组织身份理论、布迪厄“惯习”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域路径突破理论进行严格辨别，论证审美惯性切开了既有概念装不下的新区分面；最后正面回应“理性选择替代解释”等最有力的反驳，以当代硅谷正在发生的审美收窄作为检验性观察，并给出操作化的证伪条件。审美惯性并非在重述“城市变得保守”这一浅层观察，而是在追踪一种比“保守”更隐蔽、也更根本的机制：在系统最成功、最自治的时刻，成功本身会生出一套美的标准，而这套标准会自动排除那些长得不像这个成功的新可能。

关键词

城市创新能力；审美惯性；前意识排除；制度逻辑；组织身份

一、问题的提出：在巅峰期被排除的转型能力

1.1 一个不同于“衰败”的城市谜团

城市叙事中有一套熟悉的剧本：一座城市因某种资源、产业或地理禀赋而崛起，当外部条件改变——矿脉枯竭、航线改道、技术更替——它陷入停滞，最终沦为锈带。这套剧本解释了从矿业城镇到老工业基地的诸多案例，但它回答不了另一个更隐蔽的现象。

有些城市在丧失根本性创新能力时，并非因为外部条件恶化。恰恰相反：它们正处于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旧产业仍有全球竞争力，人口在净流入，公共财政健康，文化生活丰富——一切可观测的指标都在说“这座城市正活得很好”。然而正是在这种巅峰期，城市产生下一次根本性跃迁的能力

——那种跳到一个与旧有核心产业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全新维度、再塑城市经济主轴的能力——正在消失。

威尼斯提供了最尖锐的历史案例。15世纪中期的威尼斯共和国，地中海贸易体系臻于极盛。它的商船队遍布已知世界的沿海，金融工具、外交网络、海军力量与造船技术构成了一套精密咬合、顺畅运转的自组织机制。但正是在这套机制运转得最完美的时刻，威尼斯对一场将彻底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反应迟缓：葡萄牙人正在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推进，一旦绕过好望角，大西洋航线将把地中海从世界贸易的中心甩成边陲。

威尼斯的情报网络并非不知道这些进展。早在15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就已传回泻湖。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在其关于威尼斯海上共和国的权威研究中描述了这种迟缓反应——从1415年葡萄牙攻占休达达到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威尼斯有整整八十多年的时间窗口，却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战略回应。[1]

这不是某个人的失职，也不是一群人的愚蠢。莱恩和布罗代尔的研究材料都表明，在威尼斯的决策结构中，从港口代理商到船主，从商人到参议员，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做出了在当时信息环境下最具合理性的判断——在地中海的既有贸易体系里安稳获益，远比冒险闯入未知海域“划算”。没有单独的决策者需要为此负责。但合在一起，合成的是整个共同体对一个正在逼近的根本性变化的系统性漠视。

这种漠视的根源比通常说的“自满”或“路径依赖”更隐蔽。它不是“看不见”，也不是“转不动”。它是一种在改变尚未被正式思考的层面就已经完成的扼杀。本文要追问的，就是这个扼杀机制到底是什么。

1.2 既有解释路径及其止步之处

既有的城市研究与演化经济学对这一类现象并非全无察觉。四条主要的解释路径各自抓住了某个侧面，但都停在一个共同的临界点之前。

路径依赖指出，早期的偶然优势会通过正反馈自我强化，将城市锁入次优的技术轨道。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底特律的汽车工业被反复引为经典案例。路径依赖解释了“旧路为什么困死了转向动作”，但它讲述的是一个“系统想转但转不动”的故事。威尼斯的谜团需要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在旧路尚在盈利、无路可转的信号尚未明确到所有人都看得见的漫长巅峰期里，系统并没有被“锁住”无法动弹——它甚至没有产生“想转向”这个念头。这是比“转不动”更隐蔽的状态：不是困于牢笼，而是连牢笼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这个事实本身，都被排除在可感知的范畴之外。

认知锁定将路径依赖推至区域层面，其中格拉伯提出的“认知性锁定”——因长期共处形成的共享世界观阻碍了对外部变化的识别——尤其贴近本文的论域。但格拉伯的模型解释的是“外部变化发生以后，为什么行动者看不见”；威尼斯的案例挑战的却是“外部变化正式发生之前，系统为什么已经在持续制造‘看不见它’的条件”。15世纪中期，大西洋航线尚未开通，“外部变化”在严格意义上还没有发生；葡萄牙人的探索只是地图边缘的一系列微弱的、尚无成功先例的试错。威尼斯系统对它的漠视，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盲视，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预判性排除：这串发生在远离泻湖的蛮荒海域上的小动作，“不像一件值得威尼斯去认真对待的事”。[2]

核心僵化或“能力陷阱”来自组织行为学，指出组织围绕其核心竞争力形成的整套技能与价值观，在新环境来临时会变成阻碍。这一概念最贴近本文论域，但它是以企业为原型的。城市不是企业。当一座城市陷入“能力陷阱”，这不是一个集中决策中心可以强行扭转的。城市的能力散布在几万几十万独立个体各自拥有的技能、习惯与判断中，它的“僵化”因此需要不同的解释机制。更重要的是，能力陷阱的实证研究多在环境已变之后回溯僵化的根源；审美惯性试图做的，是解释在外部环境尚无显著变化的巅峰期，那种无声的、在个体感知层面扩散的排除动作。

雅各布斯的活力理论论证城市活力源于短街区、混合用途与稠密人群的自发互动，她天才地描述了活着的街道长什么样，但没有系统追踪：为什么一些曾经同样鲜活的街区，在几十年后变成了只能重复旧事物、却再也拱不出新事物的空壳。从“能产生新事物”到“只能重复旧事物”的那道转化，究竟发生在哪一刻？由什么触发？

这四条路径各自在某个临界点停下了。本文试图越过那个临界点，去追踪一个此前没有被系统地命名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机制：一座城市在其最成功的运转中，其内部会生成一套如何感知“什么才是好的、值得做的、配得上这座城市的”的深层直觉；这套直觉在预判的层面，就把那些与旧美不符、却又可能是下一次跃迁胚胎的异质念头，提前排除在可思考的范畴之外。

本文把这一机制命名为审美惯性——不是因为“审美”这个词更漂亮，而是因为这套机制运作的层面不是理性计算、不是认知推理、不是组织路径，而是一种更接近身体直觉、更接近“这事对不对味”的美感判断。

1.3 核心判断与全文结构

本文提出的核心判断是：一座城市持续产生根本性创新的能力的衰减，其要害不在于那些能逼出创新的“尖锐张力”被成功所软化，而在于成功运转本身会在系统内部自动生成一套强大的、排他的审美感知结构。这套结构在集体层面定义了“什么是美的、值得做的、配得上这座城市的”，并在行动者尚未进入审慎权衡的层面，就提前将萌芽中的异质念头标记为“不体面”“不像我们做的事”“不合这座城市的身分”，从而在它们被正式思考或公开讨论之前，系统性地完成了对下一次跃迁可能性的提前排除。

这不是一个“活力被外部力量消灭”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系统变迟钝”的故事。这是一个“成功本身会生出一套美的标准，而这套标准会自动排除那些长得不像这个成功的新可能”的故事。排除的过程比消灭更隐蔽，因为它从来不直接杀死任何东西——它只是让新东西没有机会被认真对待。这个机制的关键在于：它不是理性否决（评估之后说“不”），而是审美过滤（在评估之前就已经被归入“不值得评估”的范畴）。

本文的论证将按以下结构展开。第二章从威尼斯和曼彻斯特两座城市在各自巅峰期丧失转向能力的具体历史矛盾入手，让审美惯性的轮廓从史实的裂缝中挤出来；同时追踪这套审美结构是如何从城市的成功运转中一步步沉淀、凝结、内化为集体感知的。第三章将审美惯性放置在与最危险的理论邻居——制度逻辑理论、组织身份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关联度理论——的严格辨别之中，论证它切开了既有概念装不下的新区分面。第四章正面回应三个最有力的反驳：审美惯性是否只是经济理性的审美化包装？有些城市是否在巅峰期完成了无僵局的跃迁？

僵局为什么在某些城市只带来衰亡而非跃迁？第五章以当代硅谷正在发生的审美收窄作为检验性观察。第六章给出操作化的证伪条件，诚实交代理论的边界。

二、历史发生：让机制从案例的裂缝中逼出

概念不应作为被预先定义好的模具去套案例，而该作为对历史矛盾的解释性追问，从具体的历史材料中逐步浮现。本章从威尼斯和曼彻斯特两座城市在各自巅峰期丧失转向能力的具体矛盾入手，让审美惯性的轮廓从史实的裂缝中挤出来。需要事先诚实说明的是：本文对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叙述，是基于已有经典历史研究（莱恩、布罗代尔等人的著作）的理论性重构，其目的是让一种被既有理论忽略的机制从历史材料的裂缝中变得可见，而不是提供史学意义上的一手考证。文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情境——威尼斯的贸易数据、葡萄牙航海进程、曼彻斯特的产业转型——均来自权威史学论著，但本文对这些材料的组织与解读，服务于概念提炼的目的，不应被视为对该城市史的唯一或权威叙述。

2.1 威尼斯：为什么八十年的窗口期无人认真对待大西洋？

1423年，威尼斯总督托马索·莫塞尼戈在临终前留下了著名的遗训。他列举了威尼斯共和国惊人的贸易数据：每年在地中海内的贸易总额高达一千万杜卡特，商船队规模、造船能力、金融储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他的遗训是一份充满骄傲的清单，也是一份无意的诊断书——他忠告继任者：维持现状、避免冒险、守住既有的财富和荣耀。这份遗训的逻辑在威尼斯的统治精英中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此后数十年间，它成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政策基调：这里的一切都运转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去做那种可能会折腾垮掉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自洽感的顶峰期，葡萄牙人正在沿着非洲西海岸一寸一寸地向南拱。从1415年攻占休达到1488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再到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整整八十多年，威尼斯的情报网络不断传回消息，却没有催生出任何严肃的战略回应。莱恩指出，威尼斯并非没有航海技术或资本；它的造船和导航能力仍然是全欧洲的巅峰。问题出在别处。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记录了一个更隐蔽的内部转变：从15世纪起，一部分威尼斯显贵家族开始将资本从海上贸易转向意大利内陆的农业土地投资。在布罗代尔的叙述中，这不是一次被规划的战略转型，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家族在几十年间各自做出的、互不协调的选择缓慢累加的结果。选择陆地的理由很充分：土地收益更稳定，管理更可控，不像远洋商船那样受制于风暴、海盗和外交变数——一句话，更“安稳”。每一次个体层面的理性转移，都在悄悄改变威尼斯资本存量的总体结构。当达·伽马返回里斯本的那一刻，威尼斯发现自己不仅错过了回应窗口，而且整个资本与人力配置的基底都已经不适合向大西洋方向做出重大转向。

这里需要诚实地面对一个时间线的问题。布罗代尔所描述的从海上贸易向土地投资的转移，其起始时间在15世纪早期，这一趋势在葡萄牙大西洋探险的关键信息传回威尼斯之前就业已开始。因此，土地投资转向本身不能直接被解释为“对大西洋探险的审美排除”——它最初是由意大利半岛内部的经济机会（农业价格上涨、土地可得性增加）驱动的独立过程。然而，这个转向的持续与深化，却与威尼斯的审美结构发生了致命的相互作用：当大西洋探险的信息逐步传回泻湖时，那些已经将资本锚定在陆地资产上的显贵家族，恰恰是威尼斯政治决策层中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他们对大西洋探险的漠然，不完全是因为“土地更赚钱”（这可以解释最初转向的动机，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后续没有重新评

估），而是因为那件事在他们的感知体系中根本不被视为一个可以与“威尼斯海上共和国”这一身份相匹敌的选项。

这里浮现出一个需要更精确界定的机制——它比路径依赖或认知锁定更多一层东西。那些转向土地投资的威尼斯贵族，他们的选择最初是理性的经济计算。那些继续从事地中海贸易的商人，他们的判断在当时也没有错——直到1498年之前，地中海依然是全球最赚钱的贸易通道。问题并不出在任何个体的决策失误上，而是出在这些决策背后共享着同一个未被陈述的前提：威尼斯的方式是对的，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都发生在威尼斯的体系之内；地图边缘那些没有大理石宫殿背景、没有千年共和国传统背书的东西，不是我们该认真对待的事。

这个前提不是通过明文规定确立的。它生效的方式更接近于一种弥漫性的品味判断。在威尼斯编年史家对葡萄牙人航海活动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这种判断的痕迹。当时的威尼斯史料在提及葡萄牙人的大西洋探索时，往往使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那些活动被描述为“远方的冒险”“蛮荒海岸的试探”，而非“可能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行动”。这不是一种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而是一种格调贬低（taste dismissal）：大西洋探索在威尼斯人的感知中，被归入了一个既非“危险”也非“无关紧要”的特殊范畴——它被感受为“不够体面”。不是“那会被风暴吞没”，而是“那不像一个威尼斯人该做的事”。

这种“不够体面”的判断，有其具体的运作方式。它不通过参议院的正式投票来表达；它通过在无数日常交谈中重复出现的那句“我们这里不那样做事”来扩散。在码头、在商会的非正式聚会、在家族晚宴上，当一个年轻人偶尔提起“也许我们该派人去里斯本看看”时，他的试探所遭遇的不是激烈的反对——那反而可能激起辩论——而是一阵礼貌的沉默、一个转换的话题、一句温和的“别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每一次这样的小动作都太微小了，微小到不值得被历史档案记录；但它们在几十年间被重复了几万次，累积起来的效果是：整个共同体中，那些可能导向转向行动的微弱冲动，在尚未长成能被正式讨论的“选项”之前，就已经被消解在日常交往的纹理中。

这正是审美惯性区别于制度逻辑或理性选择的关键所在。制度逻辑理论可以解释威尼斯作为一个“海上贸易共和国”的制度性配置如何引导了行动者的注意力分配——它的地中海贸易网络、金融工具、外交惯习共同构成了一套“沿海贸易的制度逻辑”，这套逻辑确实可以解释威尼斯为什么难以跳到大西洋维度。但制度逻辑理论停在一个临界点之前：它解释了“注意力被分配到哪里”，却没有解释“那些未被分配的注意力范围中，被分配之前的那道过滤的结构是什么”。威尼斯的案例显示的，正是这种过滤不是通过制度性程序完成的，而是通过一种弥漫性的、更接近美感判断的东西——在行动者尚未进入“要不要做这件事”的理性计算之前，对“这件事是否值得被计算”的感知已经做出了判决。这种判决的判据不是制度合规性（institutional appropriateness），而是审美合宜性（aesthetic fitness）——“它配得上这座城市吗？”

2.2 审美惯性的发生：成功如何沉淀为排他的感知结构

审美惯性不是从虚空中降临的。它有一个可追踪的发生过程——城市的成功运转，通过一系列具体渠道，在一定的节奏下，将一种特定的“什么才是好的”的直觉感知，沉淀为被集体内化的审美标准。威尼斯案例为追踪这一发生过程提供了精细的历史材料。

2.2.1 沉淀的渠道：从日常交谈到空间表征

成功是如何沉淀为美的？它的第一条渠道是那些被重复了几万次的日常交谈。在威尼斯，每一个顺利返航的商船、每一笔成功交割的贸易合约、每一次被妥善处理的外交危机，都在为“威尼斯的方式”提供新的证据。这些证据不是被汇总成报告呈交给某个决策中心；它们在码头的卸货声中、在里亚尔托桥边的商谈中、在家庭晚餐桌上被一次次地转化为话语：“今年这趟又赚了”“地中海的航线就是稳”“我们威尼斯人做生意的路数，别人学不来”。每一次成功的重复都是一次审美判断的再生产：这件事不只是做得成——它做得对，它做得美。

第二条渠道是城市物质空间的自我表征。威尼斯的大理石宫殿、圣马可大教堂的黄金镶嵌、运河两岸的商业建筑——这些不是中性的物理设施。它们是“威尼斯是什么”的物质宣言。一个每天走过里亚尔托桥的年轻商人，他的身体被这些物质符号不断地浸染：这座城市用每一块石头在告诉他，“体面的事”长这个样子，“成功”闻起来在这个味道。当葡萄牙人的船只从里斯本港口驶出时，它们出发的空间是一段完全不同的物质景观：粗糙的航海工坊、木制码头、没有大理石宫殿映衬的远方。大西洋探险与那个被用来定义“威尼斯式成功”的物质空间之间，没有任何感官上的共鸣。它在那套空间表征体系中天然地“不像真的”。

第三条渠道是叙事体系的再生产。威尼斯的官方编年史、外交文书、节日庆典的修辞，反复讲述着同一个叙事：“海上共和国”“亚得里亚海的新娘”“千年自由的守护者”。这些叙事不只是回顾过去——它们在持续地生产着一套关于“什么配得上这座城市”的集体标准。当一个新选项出现时，它被城市叙事判定“属于我们还是不属于我们”的速度，远远快于它被经济理性分析“划算还是不划算”的速度。大西洋探险缺乏任何与威尼斯主流叙事相衔接的符号资源——它不能被讲述为“海上共和国”的延伸（因为大西洋不在亚得里亚海的叙事范围内）、不能被视为“东方贸易”的新路线（因为它朝西）、不能嵌入“千年传统”的谱系（因为它是一部葡萄牙人刚写下的新剧本）。它在威尼斯的叙事体系中没有可供抓取的意义锚点。

2.2.2 沉淀的节奏：无声的临界点

审美惯性的形成不是匀速进行的。它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无声临界点。在威尼斯的案例中，这个临界点大致发生在15世纪中期——在威尼斯的海上贸易体系已经不间断地成功运转了近两百年之后，在它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文明都达到了一个让同代欧洲人艳羡的高度之时。在这个临界点到来之前，成功经验的每一次积累，对于保护系统免受外部干扰是有益的——它帮助威尼斯建立了一套抗风险的制度缓冲层。但超过这个临界点之后，成功经验的持续积累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了它的功能：它从“保护系统免受破坏”变成了“保护系统免于被质疑”。成功的厚度越积越厚，异质念头要穿透这层厚度，需要的能量就越来越大。当厚度大到让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顶破时，系统就进入了审美惯性。

这个时间尺度在不同城市会有差异。它与旧成功的持续时间长度、成功的集中度、城市自我叙事的单一性成反比。威尼斯之所以在这个尺度上走得如此之远，恰恰因为它的成功太单一了：它的几乎全部精英阶层的身份认知、财富来源、社会地位，都被紧密地编结在“地中海海上贸易”这一条主线之上。曼彻斯特在棉纺织业上同样经历了类似的集中度。相反，那些始终保持多元产业底盘的城市（如19世纪末既可以是制造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和出版业中心的纽约），旧成功的厚度可能更薄

——不是因为不成功，而是因为成功分散在多个互相不绑定身份的维度上，单一审美的内聚力量被分散了。

2.2.3 为什么有些城市的成功沉淀为排他的审美，而有些保持开放？

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是：既然所有城市的成功都会产生某种审美结构，为什么并非所有城市的巅峰期都伴随着创新能力的绝育？答案在于调节变量的差异。

第一个变量是成功的集中度。一座城市的成功越是集中在单一的产业或活动类型上，“什么配得上这座城市”的标准就越容易收窄。16世纪的安特卫普是一个金融中心，但同时是印刷业和制图业的重镇——它的成功不集中在单一叙事轴上。当一个新念头在安特卫普出现时，它可以从不同的成功叙事中找到符号锚点。相比之下，15世纪的威尼斯几乎将其全部城市身份编入“地中海贸易”这一条主线上——一个不在这条主线上的新念头，在叙事体系中无处可落脚。

第二个变量是新血液的持续注入方式。城市在巅峰期仍然可能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但涌入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携带的异质冲动能否存活。威尼斯的巅峰期确实有大量移民——但这些人涌入的通道，是已经预设好的技术岗位、商贸学徒、底层劳力。他们进入威尼斯时，就已经被告知了一套关于“什么是体面的事”的规则。相反，在另一些城市（如几百年后的纽约），移民涌入的方式更多样、更分散，他们携带的、来处不同的审美感知彼此冲击，削弱了任何单一审美的独占位置。

第三个变量是制度对边缘试错的容忍度。威尼斯的行会体系和共和国政治结构，在巅峰期为极少数精英家族紧密控制，边缘试错的空间极其有限。一个想造新式船只的年轻工匠，首先需要获得行会的许可，而行会的审美已经与旧美的标准深度绑定。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惯性不仅在前意识的层面排除异质念头——它还有一套制度安排来物理性地阻隔它们。

2.3 曼彻斯特：成功如何把另一种未来堵死在“不配”里

威尼斯展示的是旧美如何排除了转向新航路的念头。曼彻斯特展示的是同一个机制在另一个维度上的展开：一座靠“在无路处拱出路”而崛起的城市，如何在自己的成功中凝结出一套排斥“拱路”本身的审美。

曼彻斯特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以棉纺织业完成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跃迁。这座城市的崛起，靠的正是那种“不带旧包袱、敢走旧世界不敢走的路”的野性：没有行会束缚，没有贵族权力网络的掣肘，没有对旧生产方式的留恋。它在旧秩序的裂缝里拱出了一条全新的工业路径。但正是这套让它封神的工业体系，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不仅在物质上锁定了产业轨道，更在感知层面凝结出了一套强大的审美结构。

曼彻斯特围绕棉纺织业长出的，不只是一套产业链——运河专为运棉花而挖，铁路支线专为纱锭而铺，技术学校的课程只培训纺织技工——而是一整套城市的自我叙事。从19世纪中后期的地方报纸、市议会演讲到工人俱乐部的日常交谈，曼彻斯特不断被讲述为“世界工场”“工业心脏”。这不是一个经济标签；它是一种身份的宣告，一种价值的排序，一种对“什么值得做”的直觉性界定。在当时的曼彻斯特报纸上，可以看到大量将“棉纺织”与“男子气概”“实干”“北方人的刚硬”绑定的修辞——而那些被归入“非工业”的活动（服务业、艺术、教育），则在同样的叙事中被标记为“软弱的”“娘娘腔的”“伦敦式的花哨”。[3]这套叙事的力量，不在于它被明确地写进某部究

章，而在于它渗透进了城市日常生活的纹理：学童的课本、工党的集会、新建市政建筑的雕塑——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同一种信息：在这座城市，工业是体面的，“非工业”是边缘的。

当全球棉纺织业竞争在20世纪初逐渐加剧——先来自日本，再来自印度——曼彻斯特最初几十年的应对，不是转向新维度，而是试图用更高效的方式把旧路走到底：优化纺机、合并工厂、压缩成本。每一次“优化”的努力，都在延长旧路的寿命，也都在更深地加固那套“工业才是正事”的感知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学会了把任何“不工业”的念头标记为“软弱”“离题”“背叛出身”。不是有人开会这样宣布，而是这种标记在日常交谈——在工厂茶歇时谈及“也许我们该做点别的”时，邻座那句“别傻了，除了棉纺还能做什么”的简短回应——被几万几十万次地重复。念头的提出者甚至不需要等到被人当面驳回——他自己在开口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那个后果，并且在预感的层面就选择了不开口。

曼彻斯特后来发生的转型——从棉纺衰落到成为BBC媒体城所在地、大学密集区、创意产业集聚地——不是来自某个领袖的远见或在旧路还通时的主动跨越。它是在棉纺织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彻底崩塌、整座城市面临变成空壳的危险之后，那些此前被当作“不工业”“不体面”“不像曼彻斯特做的事”的念头，才得以被重新容许、被重新想象、被重新尝试。旧美的沦亡不是新美诞生的充分条件；但在曼彻斯特这个案例中，它是新美得以被看见的必要前提。

需要诚实承认的是，曼彻斯特案例所依据的微观史料密度，与威尼斯案例并不对等。威尼斯案例有莱恩、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提供的扎实史学为基础；曼彻斯特案例则主要依赖工业革命史和城市史的一般性知识——维多利亚时代报纸的概括性语调、市议会演讲的记录、若干关于曼彻斯特工业衰落的二手研究。本文对曼彻斯特“审美排斥”的具体机制（如工厂茶歇时的对话、酒吧里的沉默）的推断，主要是基于与威尼斯案例的结构类比和在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性重建，其具体微观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档案研究与口述史研究加以检验。因此，曼彻斯特在本文中应被视为一个辅助性的对照案例，而非与威尼斯具有同等史料密度的核心证据。

2.4 机制浮现：从两座城市中逼出的三条命题

威尼斯和曼彻斯特各自经历的具体历史内容迥异，但两个案例共同指向了三件事。这三件事不是预先准备好的分类，而是在追踪两座城市各自转向失败的内部过程时，反复出现的共同纹理。

第一，巅峰期的自治会主动生成一套排他的审美感知。无论威尼斯围绕“千年海上共和国”的安稳与荣耀，还是曼彻斯特围绕“工业心脏”的刚硬与务实，两座城市在各自最成功的时刻，都沉淀出了一套被广泛内化的、关于“什么事配得上我们”的直觉。这套直觉不需要被写成条文才能生效——它生效的场域不在参议院或市政厅，而在码头、在车间、在酒吧、在家庭餐桌上的日常交谈里。它的沉淀渠道是多重的：日常交谈中不断重复的成功叙事（“我们又赚了”“还是我们这套路子管用”）、城市物质空间的自我表征（大理石宫殿、工厂烟囱）、以及官方叙事的持续再生产（“海上共和国”“世界工场”）。它的沉淀节奏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无声临界点——当成功的厚度积累到让任何个体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顶破时，审美惯性就进入了系统。

第二，这套审美在预判的层面就排除了转型的可能性，而不是在理性考虑之后才否决它。威尼斯的商人和曼彻斯特的工程师，并没有坐下来把“大西洋冒险”或“数码产业”列入议程、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然后否决。这些念头的命运更早被决定了——在它们尚未被当作一个正式的“选项”浮出水

面之前，集体的审美直觉已经把它们归入了“不像那么回事”“不体面”“不是我们这种人该做的事”的范畴。排除不是发生在会议室，而是发生在感知的门口。这种排除的判据不是制度合规性（“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则”），而是审美合宜性（“这配不上我们的身份”）——后者运作得更快、更深，因为它不需要经过推理。

第三，旧审美的排他性在巅峰期最强，无法被温和干预击穿，需要僵局来强制撕裂。在系统运转得最好的时候，内部的舒适感足够冲淡一切不和谐音，成功带来的自豪感足够强化旧审美的正当性。一个新移民、一项政府创新政策、一套外部知识引入，都无法在这样的审美厚度面前起作用，因为它们都同时可以被旧审美收编——新来的青年学着做“合格的威尼斯商人”，政府的补贴被用来进一步优化旧的纺机。只有当旧路的尽头突然立起一堵墙——利润崩塌、订单消失、整座城市面临被掏空的危险——那些“配不上这座城市”的另类路径，才被现实的铁拳强行拉回可感知、可讨论的范畴。

这三条命题在威尼斯和曼彻斯特的案例中反复出现，共同指向一个被既有文献没有系统命名的机制。它不是路径依赖（虽然可能在后期催化路径依赖），不是认知锁定（虽然共享着“看不见”的某些表层症状），不是能力陷阱（虽然结果类似僵化），不是制度逻辑（虽然制度逻辑确实在引导注意力分配）。它是一种比制度逻辑更底层的感知结构——用“审美”这个词指称它，是因为它运作的逻辑更接近美感判断：它是直觉性的、共享式的、在个体尚未意识到自己被影响时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排除工作。它区别于制度逻辑的要点在于：制度逻辑分配的是“什么是正当的”（legitimacy），而审美惯性过滤的是“什么是值得被计算的”（relevance）。在行动者进入正当性计算之前，审美惯性已经在感知层面决定了“哪些选项有资格进入正当性计算”。这种过滤不是在制度层面运作的，而是在制度扎根的感官地基上运作的。

三、概念辨别：审美惯性切开了什么？

概念的可贵不在于漂亮，在于它能否切开一个既有理论装不下的新区分面。这一判断要求审美惯性必须与理论地理上最危险的邻居正面交锋——不是与那些已经被广泛承认与本论域不同的理论做区分，而是与那些最有可能将它1:1替换掉的理论做严格的不可还原性论证。如果审美惯性压成一句话后，能被“主导制度逻辑下的注意力窄化”或“组织身份防御导致的感知过滤”无损替换，那它就只是一个文学化的修辞，而非不可还原的新结构。

3.1 与制度逻辑理论的区分：美感判决独立于正当性计算

制度逻辑理论是与审美惯性最危险、最需要正面交锋的邻居。桑顿、奥卡西奥和劳恩斯伯里等学者系统论证了，每一个社会领域中都有数套共享的认知框架与价值体系——制度逻辑——在引导行动者的注意力分配、赋予某些行动以正当性而排斥另一些。在城市的语境中，“市场逻辑”“专业逻辑”“社区逻辑”等不同逻辑会在特定历史时刻竞逐主导权。这一理论与审美惯性的表层重叠极高：两者都讨论的是“前意识层面的排除”，两者都讨论的是“某些选项被系统地不去认真对待”。如果审美惯性只是“一种特定的制度逻辑在城市层面的应用”，那它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在于排除的判据性质，而非应用领域。制度逻辑排除某一选项的判据，是该选项与主导逻辑的正当性标准之间不相容：一个行动被淘汰，是因为“这不符合市场效率原则”“这违反了专业伦理”“这在社区规范中是不被容许的”。制度逻辑的排除动作，始终是一个正

当性判定 (legitimacy judgment) ——即便它在前意识层面运作, 它的判据仍然是“合不合规矩”。

审美惯性排除某一选项的判据, 则不是正当性, 而是合宜性 (aptness) ——更精确地说, 是一种美感判决 (aesthetic judgment)。当一个威尼斯商人在听到“大西洋探险”这几个字时,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不合法”“这不专业”“这违反行业规则”, 而是一种更接近身体直觉的不适感: “这事不对味”“不像我们做的事”“感觉怪怪的”。这种“怪”, 是无法被翻译成任何一条制度正当性原则的——大西洋探险在威尼斯的制度框架下没有任何违法违规之处, 它只是违反了那套由成功运转沉淀下来的美感直觉。它被淘汰, 不是因为它不合法, 不是因为它在任何制度逻辑的标准下“不正当”——它被淘汰, 纯粹是因为它在审美上“不配”。

为了进一步钉牢这个区分, 我们需要界定: 制度逻辑的排除和审美惯性的排除在何种经验条件下会给出相反的预测。当某一选项在制度逻辑上是高度正当的——它完全符合市场效率标准、专业规范、社区价值, 但因为它来自一个与旧成功没有情感联系的空间或群体, 它在审美感知上仍然不被认定为“我们的事”——这时, 制度逻辑预测“这事应该被认真对待”, 而审美惯性预测“这事会被忽略”。一个可以在当代城市中检验的推论差异就此产生: 当一项新技术 (比如某种新型清洁能源方案) 在技术-经济评估上被证明具有显著优势 (符合市场逻辑)、且与现存政策法规完全兼容 (制度合规), 但它的主要推动者是一群“非本城出身的外来者”——移民创业者、外地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本城没有历史情感纽带的跨界人士——时, 制度逻辑理论预测这项技术会被积极采纳 (因为它正当性满分), 而审美惯性预测它会遭遇一种特殊的、难以被诉说的阻力: 不是被正式否决, 而是在无数非正式场合中被“搁置”“不再提起”“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个推论的差异是可检验的——如果确实观察到大量的“正当性满分但被系统性地忽略”的案例, 那审美惯性就在制度逻辑之上增加了额外的解释力。

3.2 与组织身份理论的区分: 城市的浸透式身份无法被“再定位”

组织身份理论自阿尔伯特和惠腾以来的研究, 大量探讨了组织围绕其核心身份形成的自我叙事如何排斥异质战略选项。当组织面临身份威胁时, 它会启动一系列防御机制, 将那些与其核心身份叙事不一致的战略选项排除在外。这个理论似乎可以无缝解释“威尼斯为什么不转向大西洋”: 因为“海上共和国”是它的核心身份叙事, 大西洋探索威胁了这个身份。

但组织身份理论的解释, 预设了一个它无法在城市尺度上复制的条件: 组织可以通过正式的决策程序来“管理”身份威胁。一个企业可以召开董事会, 重新定义其使命陈述, 将新的战略选项“纳入”身份叙事——这是组织身份研究中大量讨论的“身份再定位”。城市的身份感知则是在完全不同的机制上运作的。城市没有董事会, 没有可以被正式修订的使命陈述, 没有谁可以代表“城市身份”来做出一个可以被其他人遵从的再定位决定。城市身份的再生产, 不通过正式的决策程序, 而是在几万几十万次身体与其环境的交互中、在弥漫性的日常交谈中、在无法被集中控制的物质空间表征中完成的。

这意味着, 当城市的旧身份排斥一个新选项时, 那种排斥不能被任何一个核心决策者“收回”。一个威尼斯参议员, 即使他个人确信“大西洋探险值得一试”, 他也无法通过一个参议院决议来改变其他几万个威尼斯人每天走过大理石宫殿时, 身体自动感知到的那个信息: “体面的事长这个样, 大西洋不长这个样。”组织身份理论在城市尺度上失效的地方, 恰好是审美惯性生效的地方——它的机

制不是“身份的正式再定位被结构性障碍所阻”，而是“那种可以由正式决策来操作的‘身份’，在城市中根本就不是身份再生产的首要方式”。

3.3 与注意力基础观的区分：审美惯性不分配注意力，而是定义“值得被注意”

奥卡西奥提出的注意力基础观，是第三个危险的近邻。该理论将组织的决策结果归结为行动者注意力的结构性分配——注意力流向哪里，取决于组织的结构性配置（规则、资源、社会关系）将哪些议题和答案“引导进入”行动者的注意力焦点。这个理论与审美惯性的论述在表层上高度重叠：两者都讨论的是“某些选项被排除在注意力之外”。如果审美惯性只是“注意力基础观在城市尺度的应用”，它的独立性就不成立了。

关键的区别在于：注意力基础观解释的是“注意力被分配到哪里”——它的机制是引导：在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的约束下，组织的结构性配置将注意力导向某些方向而偏离另一些方向。这个机制的前提是，那些未被注意到的选项，在原则上是可以被注意到的——它们只是因为注意力资源的稀缺和结构性配置的偏向而没有进入焦点。审美惯性解释的则是更前一层：它不是在注意力分配的阶段把一些选项“导向”焦点外；它是在定义“什么是值得被注意的”这个标准的阶段，就已经把那些选项排除在“可注意”的范畴之外了。这不是“注意力没有流向那里”，这是“那里根本不被感知为一个可以被注意力朝向的地方”。

用一个比喻可以让这个区分更清晰。注意力基础观描述的是一束聚光灯，规则和资源配置决定了灯束往哪里打——灯光之外的东西是在的，只是暗着。审美惯性描述的是看者的眼睛在灯光亮起之前就已经被训练过的感知方式——他看到的不是“一片黑暗区域”，而是“那个区域本身就长成不值得被光打的样子”。制度逻辑和组织身份可以改变灯的指向和亮度；审美惯性改的是眼睛怎么判断什么东西“值得被照亮”。

3.4 与布迪厄“惯习”的区分：城市因其成功而生的自我结构

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是审美惯性需要面对的理论近邻，但它不像制度逻辑那样构成最致命的威胁，因为两者在成因结构上的差异相对明确。布迪厄的惯习是位置性的：它在阶级结构的再生产中形成，特定阶级位置的行动者通过出身、教育和日常经历，将客观的社会位置内化为身体化的品味、倾向和“分寸感”；惯习的排除机制按阶级来切割人群。审美惯性则是时间性的：它不是由行动者当下的社会位置决定，而是由城市在上一轮成功中所积累的特定历史路径所沉淀下来的集体感知结构。

一个可供检验的推论差异：布迪厄的惯习在同一阶层内部高度同质，但在不同阶层之间是断裂乃至敌对的；审美惯性则倾向于跨越阶层边界。在威尼斯的巅峰期，贵族、商人、工匠、水手之间当然存在着品味与生活方式上的阶级差异，但在“大西洋探险不像一件威尼斯人该做的事”这个特定判断上，他们更容易形成跨阶层的共识——因为那件事挑战的不是阶级身份，而是城市身份。审美惯性在这种意义上与惯习不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成因和覆盖范围上是两种不同的深层感知结构。质疑者可能指出，布迪厄后来发展的场域分析中，确实讨论了特定场域内跨阶级共享的信念结构——比如特定艺术场域内的“信念”（*illusio*）。但场域的“信念”是由场域内部特定的竞争规则与资本形式所构造的，它与阶级出身有关但不是直接由阶级位置决定。威尼斯作为一个城市，是否可以纳入“场域”分析？从布迪厄自身的框架来看，这会把“场域”的概念拉伸到超出其理论地基——场域预设了一个有相对明确边界的、行动者承认共同赌注的社会空间（如艺术界、学术界、法律界），而一座城市的日

常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并不构成这样一个“场域”。因此，即使宽泛地使用场域概念，它也无法覆盖审美惯性所讨论的那种弥漫在城市全体的感知结构。

3.5 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分：技术关联度解释不了主动排斥

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区域路径突破的文献，以技术关联度为核心概念，提供了另一个有竞争力的替代解释。该理论认为，区域更容易分支到与现有产业存在认知邻近性的新产业，而难以跳跃到认知距离较远的产业。如果只用技术关联度来解释威尼斯为什么没有转向大西洋，结论会非常怪异：威尼斯的航海技术、造船能力、远距离贸易管理经验，与大西洋探险之间的技术关联度其实相当高。导航术是通用的，船体设计可以迁移，远洋补给与贸易站管理的技能更是现成的。如果仅仅用技术关联度来解释威尼斯的迟钝，结论应该是威尼斯恰好最“适合”转向大西洋——因为它拥有全欧洲最资深的航海技术存量。但历史事实是它没有。审美惯性在这里切开了技术关联度无法解释的那个裂缝：不是跳不过去，而是从来就没想跳。

3.5 审美惯性切开了什么：一个概述

综合上述多组区分，审美惯性的不可还原性在于：它捕捉的是一种在制度逻辑、组织身份、注意力基础观这三者各自覆盖的层面之前运作的排除机制。制度逻辑分配正当性，审美惯性在正当性被分配之前就决定了“哪些选项配得上被分配正当性”。组织身份过滤与身份不符的战略选项，但城市身份的感知不是通过正式决策流程管理的——审美惯性解释的是那种无法被决策者“再定位”的浸透式排除。注意力基础观解释注意力的结构性流向，审美惯性解释“值得被注意”这个范畴本身的建构方式。这三个邻居不是错的，而是被审美惯性剥开了它们共同踩着的、但谁也没有专门去撬动的那一层地基：在正当性标准、身份叙事、注意力规则这些制度性装置之下，有一套颜色更深的、由城市特定成功历史沉淀出来的美感结构。它不是认知的封闭、不是技能的僵化、不是制度的锁定——如果硬要给它一个位置，它运作在制度扎根的那层感官土壤里。

四、反驳回应

审美惯性不是一个温和的论点。它如果站得住，对城市创新政策的推论将是令人不适的——它意味着巅峰期最常用的那些温和干预手段（人才引进、创业孵化、产业集群政策），在根本问题上可能无效。这种强硬需要直面三个最有力的反驳。其中，第一个反驳——审美惯性是否只是经济理性的审美化包装——对理论的核心构成最直接的威胁，必须优先回应。

4.1 反驳一：审美惯性是否只是经济理性的审美化包装？

这是审美惯性必须面对的最根本的反驳。它不来自某个特定的理论竞争对手，而来自一个更为基本的还原论直觉：威尼斯人之所以觉得大西洋探险“不体面”，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前意识的审美结构，而是因为他们在地中海贸易的既得利益者。维护既得利益是高度理性的行为；所谓“不体面”“不像我们做的事”，不过是利益计算的修辞外衣或前意识包装。如果这个反驳成立，全文的核心机制就被化约为政治经济学——审美只是一个漂亮的外壳，里面还是理性人在算账。

这个反驳值得被正面击打，而不是绕过去。为了论证审美惯性的独立因果地位，需要界定它在什么条件下独立于利益计算而运作。条件是：当行动者明确知道转向有利可图（即利益计算指向转向），但仍因“不像我们”而拒绝认真对待它时，审美惯性才获得独立的解释力。

威尼斯的案例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吗？在15世纪中期，大西洋航线尚未开通——也就是说，当信息传回泻湖时，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转向大西洋是有利可图的”。这是一项高风险的不确定赌局，不是一项“明确有利可图但被利益集团阻挠”的改革。在这个阶段，理性的利益计算本身就可以为“不行动”提供充分解释：冒险不值得。但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有一个盲区：它不是解释了“为什么威尼斯不去大西洋”，而是解释了“为什么威尼斯人不去大西洋”。在这两者的缝隙里，审美惯性才找到了它的位置。

“不去大西洋”这件事，在逻辑上可以有不止一个行动层次。一个行动是：拿出一大笔国家财政，造一支船队，派它去大西洋——这个层次的“不行动”，完全可以由经济理性来解释：投入太大，不确定性太高，当前地中海的利润太稳。但威尼斯的案例中“不去大西洋”还有另一个层次：在整个八十多年的窗口期里，威尼斯没有产生过一次哪怕是最低规模的、私人资助的、试探性的举动——没有一个商人带着两三条船去里斯本看看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没有一个编年史家被派去写一份详细的大西洋航海报告；没有一个参议员在正式会议上认真提议“我们最少该派人去学学葡萄牙人的导航术在干什么”。这种“连试探都不试探”的全面不动，就不是经济理性单独能解释的了——因为试探的成本极低（派一艘船、一个人、一笔小经费），而潜在信息收益在完全不确定的环境中恰恰是最高的。理性的利益计算在极度不确定的情境中应该催生试探行为——因为试探是降低不确定性的最廉价方式。在威尼斯没有发生任何试探的案例中，理性计算预测“会试探”，而实际观察是“没有任何试探”。审美惯性的独立解释力就在这里生效：那些可能推动试探行为的人，当他们脑中的试探念头还处于刚萌芽的、尚未形成正式提案的模糊阶段时，就已经被那套弥漫在码头和商会中的审美结构排除了——“别傻了，谁会去做那种不着边际的事”。注意这里的排除词：“别傻了”——这不是利益计算的语汇，这是品味判决的语汇。试探不是被证明为“不划算”，而是被标记为“傻”——一个在威尼斯成功美学体系中完全没有位置的、略带滑稽的动作。

一个更近的当代案例可以进一步锚定这个区分。在硅谷，过去二十年中风险投资行业发生了一次被广泛讨论的审美收窄：投资从“这想法太疯了，但我相信你”转向了“这想法是否在已经被验证过的赛道上具有可规模化特征”。在这个转变中，一种曾经被硅谷旧审美标记为“值得赌”的念头（极度异质、尚无模式可循的早期实验），被新审美重新标记为“不成熟”“不够专业”“不是正经项目”。这里的关键是：被排除的那些念头，并不是被证明为“没有市场前景”——它们在早期阶段根本无法被证明或证伪。它们被排除的判据，不是“这个项目赚不了钱”（那是在尽职调查阶段才可能被判断的事），而是“这个项目一眼看去就不够正经”——一种在创业者拨出第一通电话之前就已经被感知到的品味判决。硅谷的风险资本不缺乏逐利动机；它的问题恰好是：在注意力被旧赛道的既有利润深度吸引的同时，那些与旧利润没有符号上相似性的新念头，根本进入不了被“计算是否有利可图”的阶段。

审美惯性因此并不是利益计算的替代品——它不是要否认威尼斯人关心利益、硅谷投资人关心回报。它是说：在利益计算可以启动之前，有一个更前端的过滤层在运作。这个过滤层决定的是“哪些选项有资格被计算”，而不是“哪些选项在计算之后被选中”。它过滤的判据不是“这能赚钱吗”，而是“这像一件能赚钱的事吗”——而“像不像”的直觉，是由旧成功的审美结构训练出来的。这种

审美结构一旦形成，它就获得了某种相对于利益计算的独立性——不是因为行动者不关心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感知利益的能力本身，已经被旧美的成功美学训练得只会识别那些“长得像旧成功”的金矿了。

4.2 反驳二：有些城市在巅峰期完成了跃迁——东京和纽约的重新审视

最严肃的反例来自一些似乎在没有明显僵局的巅峰期就主动跃迁的城市。东京在战后从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制造再向创意产业的多次转向，纽约从制造业和港口经济向金融、媒体、科技创业的转型——如果这两座城市是在旧路尚通时就完成了根本性的跃迁，审美惯性律就必须被限定范围，甚至被推翻。

首先需要对经验事实做更精细的拆解。东京在1980年代制造业巅峰期遭遇了什么？日元在广场协议后急剧升值，日本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遭受重创；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成本急速攀升。这当然不是一片废墟式的灾变，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困境：旧模式在新的汇率和成本环境下无法按原有的低成本高效率方式继续运转。东京此后的转向——向高附加值制造、向设计和创意产业转移——不是在舒适中做出的主动选择，而是旧模式的运转逻辑在新的外部约束下变“涩”之后的被迫调整。

纽约在1970年代的经历则更为剧烈。它在那个十年间经历了财政危机、犯罪潮和中产外逃——这不是一次温和的外部压力，而是一场切实的僵局。此后数十年纽约从制造业港口经济转向金融、媒体与创意，不是从“舒适中聪明地预判”，而是从“被逼到近乎破产后重组”中长出了新骨骼。

这里需要正面澄清“僵局”的定义——这直接关涉到理论的边界与可证伪性。僵局不需要以城市变成废墟为前提。本文对“僵局”的操作化定义是：系统被逼到一个旧模式无法再用原有的效率继续自我维持的位置——具体而言，当旧有主导产业或核心经济引擎的运行条件发生恶化，使得依赖旧模式的行动者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无法维持其原有水平的收入、财富积累或社会地位时，系统就进入了僵局。可观测的指标可以包括：（a）主导产业的全球或区域市场份额在连续五年内累计下降超过十个百分点；（b）地方财政收入连续三年以上无法覆盖刚性支出，导致公共服务质量的可见下滑；（c）主导产业从业者的人均实际收入在连续五年以上呈下降趋势；（d）连续三年以上人口净流出超过百分之一，且流出人口中具有较高技能水平的群体比例不低于其在本城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些指标不是僵局的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是“或”的关系），也不是僵局的充分条件——它们的意涵是在操作化中提供一个参照框架，而非划定一条机械的“僵局判定线”。东京和纽约在它们各自转型前的时期，均至少触发了上述指标中的一条或数条。

这意味着，东京和纽约的案例不是反驳审美惯性律的反例；它们恰好印证了僵局的必要性。它们不是因为没遇到僵局而伟大，而是因为在僵局降临时，旧审美的完整性被撕开了裂口，那些此前被标记为“不主流”“不体面”“不像我们做的事”的念头，才被重新容许。

4.3 反驳三：僵局不保证跃迁——为什么有些城市的僵局只带来衰亡？

第三个反驳来自相反的方向。苏联解体后的某些严重依赖单一工业的城市——如下诺夫哥罗德或顿涅茨克——经历了剧烈的僵局，但并没有从中拱出新维度，反而陷入长期萧条。如果僵局是打破审美惯性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在这些案例中它失灵了？

这个反驳直接逼向审美惯性律的一个核心边界。僵局只是强力撕裂旧审美完整性的必要条件，不是新美诞生的充分条件。旧审美被撕裂之后，新可能性能否从裂缝中长出来，还依赖另外两个条件的存余。第一，城市内部必须仍有足够数量未被旧审美完全驯化的边缘群体——那些本来就不在旧美的回报体系中占据优势位置的人。他们的感知没有被充分浸透，因而在旧美瓦解时，会比旧精英层更早、也更激进地尝试此前被压制的异质路径。第二，城市的制度结构必须有足够的弹性容忍这些“拱路者”的试错。如果僵局降临时，城市的管理体系不是弹性释放——反而因为恐慌而僵硬收紧，动用一切行政手段按死边缘区的任何不规则尝试——那么僵局就只是加速死亡，而不是重启创新能力。

在下诺夫哥罗德等案例中，这两个条件的失缺恰好可以解释僵局的无效。全员都被深度绑定在同一个工业体系之内，旧循环崩溃后，体内没有足够多未被驯化的剩余冲动可以转型拱路；而制度在冲击面前的反应是收紧而非放松，进一步碾碎了边缘试错的空间。这意味着，审美惯性律的作用范围被限定在：内部仍有足够多元的感知残余、且在僵局降临时制度未完全僵死的常规城市条件内。这不是理论的失败，而是理论的精确化。审美惯性不是对城市命运的线性命定——它描述的一种结构性风险，而非一条规律性法则。

五、补充检验：硅谷的审美收窄

硅谷不是一个已经完成衰变的样本。它正处在旧路尚在盈利、审美却在悄悄收窄的临界期。这让它成为一个可以用来检验审美惯性机制是否具备事前辨识能力的理想观测对象。需要诚实说明的是：本章对硅谷的观察，主要基于公开商业报道、行业分析文献与一般性观察，不构成系统的实证案例研究。它的功能是为审美惯性假说提供一个试探性的当代检验，而非为理论提供决定性证据。文中所引用的关于硅谷创业文化变迁、风险投资趋势的描述，是基于被广泛报道的行业共识，但这些判断仍需要通过更系统的经验研究（如创业叙事的话语分析、投资者深度访谈、专利与创业企业数据的历时比较）来加以验证或修正。

硅谷在其黄金年代——大约从1950年代肖克利实验室时期到1990年代末互联网扩张期——赖以运行的审美是一套崇尚“拱路”的反传统美学。在车库里创业是体面的，被大公司拒绝是勋章，穿着T恤牛仔裤去见投资人是宣言——“我不在乎你们那套规矩”。这套审美绝非无关紧要的装饰；它是硅谷持续创新能力的氧气。它确保了硅谷对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不靠谱、却可能是拱出新路胚胎”的异质念头，始终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可感知性。一个念头不需要先证明自己变成独角兽，只需要证明自己“足够疯”，就能获得被认真对待的入门券。

近二十年的硅谷，正在围绕自己过去的成功，建立起一套新的、与旧美迥异的审美标准。这套新审美的关键词不再是“颠覆”，尽管这个词仍然频繁出现在PPT里，它的实际所指已经收窄为“在已经被验证过的技术赛道和商业模式框架内，做出比上一个更大的版本”。“独角兽”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取代了“车库”的位置：重要的不是你做的事情多疯狂、多不像正常事，而是它长得多快、多像一个百亿估值的候选。风险资本不再坐在简陋办公室里为“这想法太疯了但我相信你”而赌；它们坐在沙丘路的会议室里，对着已经模式化的投资框架做赛道分析。年轻工程师涌入硅谷，脑海中想象的早已不是在小破屋子里改变世界，而是大公司的起薪、免费三餐、健身房和上市期权包。

与这套新审美相伴的，是支持它的一整套感官信号的全面升级。这一转变的深层后果，不是硅谷“不再创新了”（它仍然在大量产出创新），而是它正在对“什么样的创新值得做”施加越来越窄

的审美限定。那些不在已有赛道上的、看起来“不够容易规模化”的、不能便利地进入风投尽职问卷框架的念头，在创业者拨出那通融资电话之前，就已经在预感层面被自动排除——“这个方向太小众了，投资人不会感兴趣的。”排除的动作不是在投委会发生的，而是在创业者与合伙人在咖啡馆里对谈时的那一小段沉默里发生的。每一次这样的沉默，都是审美惯性在个体层面的一次微小运转。

硅谷目前不处在审美惯性的完成态。它内部的多样性仍然远超一般城市，旧美的残余仍然在某些边缘区域中存活。但它的审美标准正在以可辨识的方式收窄，那些“不够美”的新念头正在以系统性的方式被提前标记为“不值得做”。如果本文追踪的机制是对的，硅谷未来能否继续产生根本性的维度跃迁，将不取决于它现有的市值或技术领先，而取决于是否有一些足够的僵局——一次关键技术的范式转换、一次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地缘断裂、或一次代际文化对撞——在它的审美自我收窄变得无法逆转之前，强制撕开那套越来越窄的“好创新”标准。

这个事前检验并不声称能预测硅谷的未来，但它提供了一个可被后续经验研究检验的观测框架。如果在未来二十年中，硅谷在没有遭遇任何满足4.2节操作化指标的僵局的条件下，从内部自发催生出至少一次真正偏离当前主导技术轨道的根本性维度跃迁，那么审美惯性律将在硅谷这一个案上被有力地地质疑。

六、结论：一个以证伪为前提的理论假说

6.1 全文收束

本文所做的工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步：从威尼斯和曼彻斯特在巅峰期丧失转向能力的特定历史矛盾中，逼出“审美惯性”这一机制假设——一套由城市特定历史成功路径沉淀下来的、在行动者尚未进入审慎权衡之前就提前排除异质念头的集体审美感知结构；同时追踪了这套结构是如何从成功中发生的——通过日常交谈、空间表征、叙事再生产这三重渠道，在成功经验累积越过某个无声临界点后，将“什么才是好的”的直觉感知从保护系统转变为封闭系统。通过与制度逻辑理论、组织身份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关联度理论进行严格辨别，论证审美惯性切开了既有概念装不下的新区分面——它运作在正当性标准、身份叙事、注意力规则这些制度性装置之下的那层感官地基里，其排除判据不是制度合规性而是美感合宜性。正面回应了“经济理性替代解释”等最有力的反驳，论证了审美惯性在利益计算无法解释“为何连最低成本的试探性行为都不发生”的缝隙里，获得了独立的因果解释力。以硅谷作为事前检验，并诚实交代了理论的边界。

最终凝结的审美惯性律由三层构成。第一，在巅峰期，城市成功运转的副产品之一是生成一套排他的、被广泛内化的审美感知结构——一套关于“什么事配得上这座城市”的前意识直觉；它的发生渠道是日常交谈中的成功叙事、城市物质空间的自我表征、以及官方叙事的持续再生产，它的沉淀节奏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无声临界点。第二，这套结构在行动的预判层面就提前排除了异质转型的可能性，其机制不是理性否决，而是审美标记——“不像那么回事”“不体面”“不是我们这种人会做的事”；排除的判据不是制度合规性而是美感合宜性，因此它独立于制度逻辑、组织身份和注意力分配的既有解释。第三，温和干预不足以击穿巅峰期的审美厚度，打破它需要僵局——一种强到足以强制撕裂旧审美完整性、将那些被长期标记为“不配”的路径重新拉回可感知范畴的外部压迫；但僵局只是必要条件，其是否导向跃迁还取决于城市体内未被驯化的边缘群体的存余与制度弹性的存余。

6.2 边界的诚实交代

审美惯性律的作用范围有其明确的边界。它不是对城市命运的线性命定——它描述的是一种内置的、在自洽巅峰期会累积的感知封闭倾向，可以被偶然因素打断。它仅限于“产生根本性维度跃迁的能力”的丧失，而非城市一般生活质量或文化丰富性的衰退。它严格绑定于城市的分布性决策特征——城市没有集中决策中心，它的感知结构是通过无数个体的日常互动在无意识中集体生成的；这一特征使得审美惯性不适用于那些由集中决策主导的组织体（国家、企业）。它与战争、禁运、全球体系崩解等极端外部情境下的衰亡是不同的解释对象。

从本文的论证中可以清晰识别出三个调节变量。第一，城市成功的集中度：成功越是集中在单一产业或活动类型上，“什么配得上这座城市”的标准越容易收窄，审美惯性越早抵达临界点。第二，城市边缘群体被旧审美驯化的程度：驯化越彻底，僵局之后可供拱路的剩余冲动越少，僵局越可能只带来衰亡而非跃迁。第三，城市制度结构在僵局降临时的弹性：制度越刚硬、对边缘试错的容忍度越低，新美越难以从裂缝中爬出。

6.3 两个操作化的证伪条件

审美惯性律对自身的诚实，最终体现在它愿意并能够被推翻。以下两个证伪条件是操作化定义的、可观测的。任何一条被干净的实证案例满足，本律即告退场。

条件一：无僵局的维度跃迁。 找到一座城市，在连续二十年以上的时间窗口内同时满足三个特征：主导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没有明显衰减（市场份额未出现连续五年累计下降超过十个百分点）；地方政府财政运行正常（未出现连续三年以上无法覆盖刚性支出的情况）；该城市在技术关联度上与旧产业无上下游衔接的非相关新兴产业中，新创企业的进入率持续低于全国或全球可比城市中位数；该城市在这二十年间未发生满足4.2节操作化指标的战乱、禁运、地方财政危机或主导产业就业人员实际收入连续五年以上下降等重大冲击；但即便如此，该城市仍在此期间自发地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维度跃迁——跳到一个与旧产业无上下游关系的新产业，且该产业在此后二十年中逐渐成为城市新的经济主轴。如果能找出这样一个干净的案例，审美惯性律的核心断言——“打破审美惯性必须依赖僵局”——就被证伪。

条件二：持续三十年的不间断跃迁。 找到一座城市，在连续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其主导产业每隔不超过十年就发生一次根本性的、非连续的替代——不是旧赛道的技术升级，而是从一条产业链跳到另一条与旧链无上下游关系的新产业链，且每次新产业都在跃迁后替代旧产业成为经济主轴。如果存在这样一座城市——在不需要任何僵局逼迫的条件下，在连续三十年的自洽巅峰中从内部自行完成了至少三次根本性跃迁——那么审美惯性律所描述的那种审美自我封闭倾向，就在这个案例中被完全克服了。某种尚未被识别的持久“抗体”机制足以系统性地阻止审美惯性的形成，意味着本理论就此退场。

在找到一个干净地满足其中任意一条的实证案例之前，审美惯性律暂立。

6.4 一个最后的思想

审美惯性不提供治愈方案，也不允诺未来。它只是提出一个让人不大舒服的观察：在人类城市的历史中，一些最伟大、最繁荣、运转得最完美的城市，恰恰是被自己的完美给困住了。它们不是被敌

人杀死的，不是被灾难摧毁的，不是被后来者弯道超车的。它们是在自己的巅峰期，在自己最美、最舒服的时刻，被一套从自己成功中生长出来的美的标准，悄悄剔除了孕育下一个自己的骨头。

如果有一天你站在一座一切似乎都好得不能再好的城市里，感觉一草一木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平稳运转——请你留意。一座城市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它被围困、被冲撞、被逼到墙角的时候；而是它已经太久没有遇到过一堵用老办法如何也走不通的墙，久到它忘记了——那堵墙，曾经正是它之所以成为它自己的产床。

证伪铭文： 如果能在任何一个在操作化定义上明确未遭遇僵局的城市案例中，观察到在连续二十年的巅峰期内自发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维度跃迁，审美惯性律即可被推翻。

（全文完）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续）

本节由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发表前补入，只处理原稿未正面对质的最近邻，不改动作者的命名、论证与结论。每一节按「承认占位 → 剩余分工 → 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三段推进。

附一·1 与克里斯坦森「价值网络」的切割：算账之前与算账之中

价值网络是本文最危险的近邻，正文未碰。克里斯坦森论证：在位企业错过破坏性技术，不是因为愚蠢或迟钝，而是因为它所处的价值网络里——由客户结构、利润率门槛、市场规模标准共同定义的那套判准体系——破坏性技术在当期各项指标上确实不合格。价值网络因此正是「一套决定什么算好、什么值得投入的判准体系」，它也解释了排除发生在正式立项之前。

分离线在于排除走的是哪条通道。价值网络的排除**走的是理性计算通道**：在位者算过账，而且账算得没错——克里斯坦森全部的力量恰恰来自「他们没有犯错」。本文的审美惯性**在算账之前完成排除**：异质念头在被转化为一个可计算的方案之前，就已被「不体面」「不像我们做的事」

「配不上这座城市」标记出局，因而**从未进入价值网络的算账程序**。前者留下一笔算错方向的正确账；后者连账本上的一行都不会留下。

这条分离线可以直接由档案裁决：若被排除的异质选项**留下了评估痕迹**（可行性研究、试点预算、正式否决记录、成本收益测算），支持价值网络解释；若它**在正式档案中根本不存在**、只在私人书信与非正式场合被提及，并且伴随的是品味性贬语而非指标性论证，支持审美惯性。威尼斯八十年窗口期正落在这一格上：可裁决的问题不是元老院是否否决了大西洋航线，而是它是否曾把大西洋航线列入过议程。

附一·2 与「主导逻辑」的切割：认知地图与感受判决

普拉哈拉德与贝蒂斯的主导逻辑指高层共享的、关于「在这个行业里如何挣钱」的心智地图，用以解释多元化失败与转型迟滞。它同样是集体的、同样先于具体决策、同样解释「看得见却动不了」。

分离线在于它属于哪一层。主导逻辑是**认知的**——它由信念与因果地图构成，可以被新信息、新高管、新数据修正，所以这一支文献的标准处方是「忘却学习」（unlearning）。审美惯性是**感受性的**——它是关于美与体面的直觉判决，不以命题形式表达，因而也不因命题被驳倒而松动。你可以向一个人证明他的因果地图错了；你无法向他证明他觉得难看的东西其实好看。

由此得到本文最愿被推翻的一条预测：向决策者提供压倒性的、明确指向异质选项的量化证据，主导逻辑框架预测排除强度显著下降；本文预测排除强度基本不变，但**排除的说辞会从品味语言转换为技术语言**——从「不像我们做的事」变为「技术尚不成熟」「时机未到」。即说辞替换而结论不变。若采纳率随证据显著上升，审美惯性的前意识定位即被推翻，它应当被降格为主导逻辑的一种修辞变体。

附一·3 与本栏前作的分工：感官侧的沉积与共同体侧的沉淀

本栏刘言言《粘附：审美发生中的核算悬置与感官沉积》处理的是个体审美感知如何在反复接触中沉积并固化。两文共享「审美会沉积、沉积会封闭」这一母题，必须划清各自的承载者。

粘附的沉积发生在**感官侧**——它是一个人的感知系统在核算悬置状态下逐层堆叠出的滤网，其承载者是身体。审美惯性的沉淀发生在**共同体的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它通过日常交谈的用词、行业评论的褒贬、空间表征的取舍传播，其承载者是一座城市的公共语汇，任何单个成员死去或迁出都不影响它。二者不可互相还原：一群感官滤网各不相同的人，仍可以共享同一套关于「什么配得上这座城市」的判决。

可裁决分离：若在一座城市中，个体审美滤网的同质化程度（个体层测量）与集体排除强度（话语层测量）高度相关且前者先变，则审美惯性可被还原为粘附的加总；若集体排除强度的拐点先于个体滤网同质化出现，则二者是两个独立层次。

附论二·可裁决预测

以下每一条都可以把本文判错。它们与正文已给出的证伪条件并列，而不取代它们。

1. **档案不对称**：在巅峰期错失重大转向的城市中，被错失选项在正式决策档案中的评估痕迹显著少于同期被采纳选项的匹配对照；且这一缺席程度与该城市既往成功的持续年限正相关。若被错失选项普遍留有完整的评估与否决记录，则理性计算解释胜出，审美惯性不必被提出。
2. **说辞替换而非结论改变**：在受控信息干预（向同一决策群体提供强量化证据）之后，异质选项的采纳率不显著上升，而拒绝理由的语言类型从评价性词汇（体面、格调、像不像我们）显著转向技术性词汇。若采纳率随证据显著上升，本文关于「排除发生在审慎权衡之前」的定位被推翻。
3. **沉淀的时滞**：审美收窄指标（本地媒体与行业评论中评价性排除语的频次占比）的拐点，早于该城市主导产业市场份额下降的拐点至少五年出现。若两个拐点同步、或审美收窄滞后于份额下降，则审美惯性是衰退的结果而非原因，本文的因果方向被推翻。

注释

- [1] 材料说明：本文所引用的威尼斯历史叙述，主要基于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 Lane）的《威尼斯，海上共和国》（*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1973）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49）等历史学家的经典研究。这些历史材料在此经过理论的重新组织与裁剪，用以展开思想论证，而非提供史学意义上的一手考证。其中涉及的具体人物、决策与事件均为公开史料所载，但本文的叙述简化了复杂的历史情境，仅服务于概念提炼的目的，不应被视为对该城市史的唯一或权威解读。文中对威尼斯人对葡萄牙航海活动的态度与表述的推测，主要基于莱恩与布罗代尔对威尼斯统治精英心态的一般性描述，以及威尼斯编年史对葡萄牙航海活动的记载风格所进行的历史推论。
- [2] 关于本文与格拉伯“认知锁定”的区分：格拉伯（Grabher, 1993）在《镶嵌的企业》中提出的“锁定”模型，包含了认知性、政治性与功能性三个维度，其认知维度确实涉及共享世界观导致的“看不见”。本文的立场不是否认格拉伯模型的价值，而是指出威尼斯的案例在格拉伯的框架之外展示了一个额外的、前置的过滤层：在外部变化本身尚未正式发生、因而“看不见”的对象尚未成形之前，一种基于审美直觉的“不值得看”的预判已经在运作。这不是对格拉伯的取代，而是在他的模型的基础上向更前端的延伸。
- [3] 曼彻斯特案例说明：本节关于曼彻斯特19至20世纪产业变迁的叙述，并未基于特定的单一档案研究，而是综合了工业革命史、城市史的一般性知识，包括维多利亚时代曼彻斯特地方报纸的概括性语调、市议会演讲的一般特征、以及关于曼彻斯特棉纺织业衰落的若干二手研究论著。文中对“工厂茶歇时的对话”“酒吧里的沉默”等具体场景的描述，属于在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性重建，其具体微观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档案研究、口述史研究或系统的话语分析加以检验。该案例的核心事实——曼彻斯特在棉纺织业衰落前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型，而在产业崩塌后才催生新的经济基础——是城市研究中被广泛接受的共识，但本文在论证“审美排斥”的具体机制时，对该案例的使用深度低于对威尼斯案例的使用深度。曼彻斯特在本文中的定位为辅助性对照案例，而非与威尼斯并列的核心证据。
- [4] 关于布迪厄惯习理论：本文所对话的布迪厄“惯习”（habitus）概念主要依据其《区隔》（*La Distinction*, 1979）与《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 1980）中的系统阐述。本文承认布迪厄后来发展的场域分析（如《文化生产场域》等著作）确实讨论了特定场域内跨阶级共享的信念结构，但论证城市场域概念在布迪厄框架下的适用范围，超出了本文的篇幅与论域。
- [5] 关于制度逻辑、组织身份与注意力基础观：本文在第三章与这些理论的对话，主要基于其各自的核心文献——制度逻辑：Thornton, Ocasio & Lounsbury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组织身份：Albert & Whetten (1985); 注意力基础观：Ocasio (1997)。本文对这些理论的引用，停留在对其核心论点的精确概括与比较的层面，未深入其内部辩论与最新发展。本文论证的重心不在于对该理论的系统综述，而在于展示审美惯性在解释机制上与之不可互相还原的层面，即运作判据的性质差异（美感合宜性 vs. 制度正当性/身份一致性/注意力结构性分配）。
- [6] 硅谷的检验性观察：本文对硅谷近二十年“审美收窄”的描述，参考了多项关于硅谷创业文化、风险投资趋势和科技公司招募的公开分析与报道（包括行业媒体如TechCrunch、The Information的分析文章，以及风险投资行业报告），但不构成一项独立的实证研究。此处的叙述旨在展示审美惯性假设在当代临界案例中的适用可能，其判断仍有待更系统的数据收集（如创业叙事的话语分析、投资者访谈、专利申请与新创企业数据的历时比较）来证实或证伪。文中“年轻工程师涌入硅谷”等表达是综合性的描述，不代表特定个体。
- [7] 证伪条件的操作化：本文提出的两个证伪条件在原则上均可操作化为可观测的实证命题，但具体操作需界定“维度跃迁”“主导产业”“非相关新产业”“僵局”等概念的操作化指标，例如使用专利分类、产业分类代码、企业数据库、经济增速与人口变动等数据。本文在第4.2节对“僵局”的操作化指标做了初步界定（市场份额、财政收入、实际收入、人口流动等），但这些界定仍是试探性的。任何实证研究在检验这些命题时，必须事先明确定义和阈值，以避免事后解释的偏差。本文的证伪条件应被理解为：如果审美惯性律的核心逻辑成立，这些操作化条件下它应当可以被观察到有效；如果这些条件不被满足，则理论应当退场。具体的阈值设定有待进一步的方法论讨论。

参考文献

Albert, S., & Whetten, D. A. (1985).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Arthur, W. B.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 Boschma, R. (2017). “Relatedness as driver of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A research agenda.” *Regional Studies*.
- Bourdieu, P.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 Bourdieu,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 Braudel, F. (1949).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 David, P. 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Fligstein, N. (1997). “Markets as politics: 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Frenken, K., Van Oort, F., & Verburg, T. (2007).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Studies*.
- Garud, R., Kumaraswamy, A., & Karnøe, P. (2010). “Path dependence or path cre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 Grabher, G. (1993). “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In G. Grabher (Ed.),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 Jacobs, J. (1969). *The Economy of Cities*.
- Lane, F. C. (1973).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 Leonard-Barton, D. (1992). “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ities: 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March, J. G.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 Neffke, F., Henning, M., & Boschma, R. (2011).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 over time? 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 Ocasio, W. (1997).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Thornton, P. H., Ocasio, W., &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本次发表前补入（对应附论一各节，均为真实文献）：

- Christensen, Clayton M. *The Innovator’ s Dilemm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 Prahalad, C. K., and Richard A. Bettis. “The Dominant Logic: A New Linkage between Diversity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7, no. 6 (1986): 485–501.
- Tripsas, Mary, and Giovanni Gavetti. “Capabilities, Cognition, and Inertia: Evidence from Digital Imag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2000): 1147–61.
- Levinthal, Daniel A., and James G. March. “The Myopia of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 (1993): 95–112.

关于本文创新智商标注

本文的盲评分为 **134**（评分者未参与本文写作，具备评分资格）。附论一与附论二由编辑部补写，补写后的 **138** 是**修改设计目标**，不是认证分——按本栏规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参与撰写的文本

出具认证分。该分数**待独立复核**。评分口径为 SDE 创新智商五维（S 结构精确度／D 差异锐度／E 纠缠深度／I 不可还原性／F 可证伪性），参照语料与评分截至日随复核一并公布。